

新人文对话录丛书

张炜

王光东

对话录

苏州大学出版社

SUZHOU UNIVERSITY PRESS

新人文对话录丛书

王尧 林建法 主编

张
炜

王
光
东

对
话
录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炜王光东对话录/张炜,王光东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12

(新人文对话录丛书/王尧,林建法主编)

ISBN 7-81090-233-4

I. 张… II. ①张…②王…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
IV. 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0180 号

张炜王光东对话录

著者/张炜 王光东

责任编辑/耿曙生

出版发行/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215021)

经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14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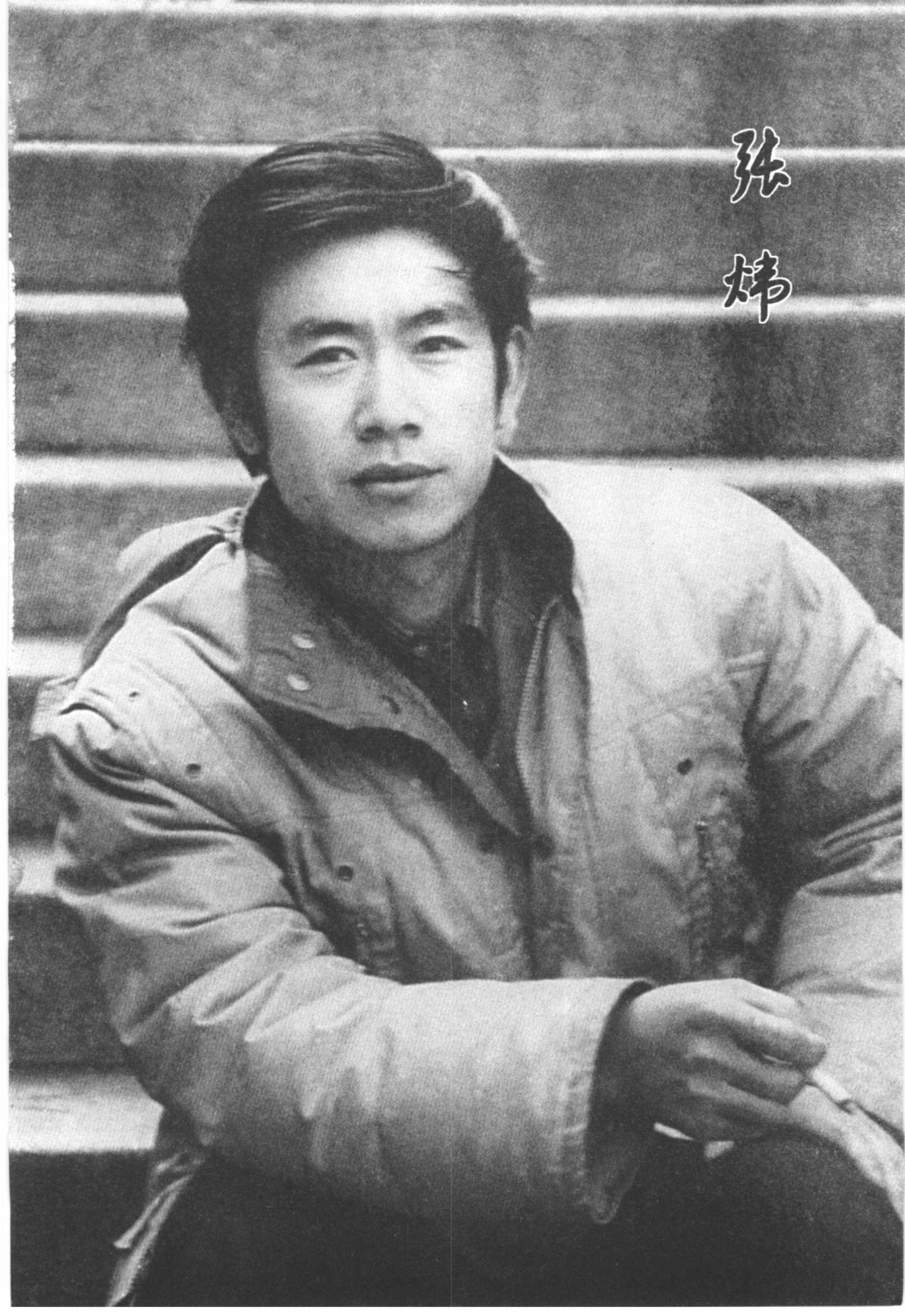
印张/7.125

印数/1-10000 册

书号/ISBN 7-81090-233-4/I·9

定价/13.50 元

张
炜



总序

王尧 林建法

我们想在“对话的时代”以“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纪念因为思和想而拥有的痛苦和快乐。

20世纪90年代那场未果的“人文精神”讨论，凸显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末期开始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源于人们对人文传统认识的差异，也与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变化了的现实有关。这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处境的体认和表达渐趋分化。对中国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的解释，一直有仁智之见。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开始使用的“人文主义”这个词，即使在西方也是含义多变的，在各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中，“人文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所以，“人文主义”虽然在中国广为使用，看似约定俗成，但其实是个概念含混的词。“人文”就字面而言，中文与西文相仿。《易经》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显然，“人文”的中西涵义有差别，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中的“人文”涵义也有差别。因此，有学者建议不妨把“人



文主义”译成“唯人论”或“人学”，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命名。正因为是“人学”，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了。即使智者仁者对中国是否有“人文精神”存在着分歧，对西方“人文主义”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管怎样，“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对历史特别是现实作出独立的解释，需要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作出深刻的反省，需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作出清醒的判断。这样的解释、反省与判断，不仅可以见出理论与思想力量的强弱，思考路径的异同，而且也可以分别出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立场。

因此，我们试图在分歧中寻找出交结点，寻找出相同的话题，就像美国的《人文》杂志所希望的那样，“不同学科的写作，能够指向一个发展中的、普遍的思想核心，作者用相互关联的眼光和方法，从不同的视角阐述核心问题”。在这种求同存异的阐述中，我们放弃那种急于给思潮、群体和问题定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仓促，而且过于自信。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遭遇的问题，都迫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信念和勇气去面对，去思和想。无论我们以暧昧的方式，还是以直面的姿态对待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总有一些问题蛊惑着思想者。也许，这可以视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



的底线，守住这一底线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裸露出他的立场。掩饰也是一种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去发现真正而动人的问题，表达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呈现被抑制的生命感受，应当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追寻的思想风度。“新人文”对话录之“新”，不是宣示一种已经成熟的思想，而是表达我们对目前所做工作的期待。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新人文”这一提法，它虽然和种种人文主义传统相联系，但是它不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徘徊，也撕去了“左翼”和“右翼”的标签。

在这套对话录丛书策划的过程中，我们（“我们”已经是个不能轻易使用的词）首先感觉到我们一些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其实愧对“人文”二字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称谓，因为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回应现实时，我们不时感受到自己的狭隘和无力，感受到清理知识与思想背景的重要。事实上，如果不能摆脱狭隘的视域，不能清理知识体系和思想背景，那么，所谓的“批判”和“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有过株守疆域、止步藩篱的教训。所以，我们期待有一次思想的飞翔。由这套丛书结集起来的一批人，基本上是“人文知识分子”一类。我们在各自的对话中，几乎都讨论到“知识分子”问题。尽管大家对“知识分子”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但都非常谨慎地

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一些朋友不敢轻易地称自己为“知识分子”；而另外一些朋友则毫不犹豫地以“知识分子”相称，并且鲜明地突出自己认为的知识分子立场。由这套丛书的“思想状况”，大致可以见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部分轮廓。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的种种解释，散发着各自生命的体温，在一定意义上，这套对话录丛书也是对话者的精神自叙。西方哲人说过，一些人是发现真理，一些人发表意见。我们当然是属于后者，而且是那种不羞于发表错误意见的一些人。

这样一点自我认识，其实也与对话体这一自由文体的特征相吻合。试图推动对话文体发展，也是我们的企图之一。那种面对面的对话，改变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思想的现场。也许，在讨论问题时对话可能失之于粗疏，但是，对话因此而呈现了思想的原生态，因此而与其他文体相区别。正是在对话之后，我们发现了对话的不易。所以，在这套丛书即将付梓之际，作为主编，我们由衷地感谢应邀参加对话的朋友们，感谢苏州大学出版社以及负责此项工作的陈长荣先生，感谢喜欢和不喜欢这套书的读者。读者也是我们的对话者。



1
知识分子与当代

47
作家应是怎样的人

87
自然、女性的意义

109
思潮、现代与传统

167
文化、文学与个性

213
后记

目
录

知识分子与当代

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有了这种精神，他就会有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声音通常并不等于谩骂，更不等于溢美之辞。真正的知识分子要谈问题必有强大的根据，这种根据可能是数字，也可能是其他。当然，最重要的根据只能是人的良知。

> 知识分子与当代 <



- > 知识分子应该以何种方式对社会发言
- > 知识分子的基本精神特质是什么
- >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缺少的是什么
- > 知识分子“个人”与“历史”的关系
- > 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对被启蒙对象的批判力量有所减弱的现象
- > 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
- > 鲁迅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是什么
- > 为什么在《古船》、《外省书》、《柏慧》等作品里出现流浪者形象
- > “现代性”对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
- > 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 知识分子应该以何种方式对社会发言

王光东：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知、道义、精神的象征，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文化语境发生变化的情形下，你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以何种方式发言？在知识分子发言的时候，他最应该注意的东西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恐怕是最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张炜：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有了这种精神，他就会有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声音通常并不等于谩骂，更不等于溢美之辞。真正的知识分子要谈问题必有强大的根据，这种根据可能是数字，也可能是其他。当然，最重要的根据只能是人的良知。现在我们觉得在许多领域里，围绕一些基本的或常识性的东西反而谈得很少，而不着边际的大话和洋话又谈得太多。外国话，一些概念和问题，由于语境和国情的区别，来到中国大半是纠缠不清的。也正因为其模糊性，又仿佛变成了极大的、令人生畏的学问。其实，即便是真正的学问，如果化不开，有时候也就会成为最不可靠的东西。对于文学作品的判断，僵死的学问使用起来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对社会问题的判断也是一样，那些僵死的无根无底的学问往往是靠不住的。在这个时期，由于认真生活而获得的意义，特别是一个人在生活中长期养成的品性，倒可以成为判断问题时最为可信的要素。

王光东：知识分子在生活中长期养成的品性是判断

一个知识分子是否优秀的重要依据，我们今天谈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有技术知识分子，还有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神财富的生产者——人文知识分子——是人类进步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推动者。但也有人对他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譬如英国的保罗·约翰逊就认为，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通常宣称其热爱人类，不过他们爱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中的具体的人，他们可以为人类设想一种美妙的图景，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同家人或朋友相处时，他们大多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自我中心主义者。还有的人认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应是保持人格的独立，做社会良知的监督者，而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大多投靠于政治集团或者商业集团，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丧失了批判的锋芒。对具体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批判是尖锐而切中要害的。把这样一种批判放置于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也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张炜：讲到这个，有时候我们很希望看到人的倔犟，但观察下来我们又

发现,倔犟也是各种各样的。没有多少根据的倔犟,使性子式的倔犟,除了偶尔博得一点喝彩之外,别无其他意义。朴素的精神和性格,这才是任何时期最为缺少的东西。人的勇气、见识、表达,所有这一切一旦失去了朴素和真实,就要大打折扣,难免有表演的嫌疑。

王光东:在20世纪80年代,作家和批评家乃至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大多沉浸在一种精神性的思考之中,这种精神在20世纪“文革”之后的文化语境中,其文化批判意义和人的精神建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它呼应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在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精神性思考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世俗生活的层面上。就文学界情况而言,作家的写作经常受到“市场”的制约,严肃的精神性写作如果没有“市场”,出版社就常常会忍痛割爱。这样一来,一些作家为了“市场”,就会认同“大众趣味”,甚至表现出强烈的媚俗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知识分子”是仍然坚持以往的精神立场,还是调整自己?

张炜:也许应该自问一句:如果我们还算是知识分子,那么对于那些重复了一千遍的俗见和谬误(更不要说谎言了)亲自动手揭破了多少?我们又采用过什么方式发言,坚持和强调了什么真实?这里说的只是真实,而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是更为崇高的、深邃的东西。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时时揭示真理,但我们能够要求一个人更多地说出真实。有时候真实也具有足够的力量。知识分子如果害怕真实,就会成为善于搞“语言贿赂”的人,就会让人心寒。反过

来，知识分子不朴素，爱使性子，爱表演，或者为了自己的一点微小利益而相互攻击滋事，也很窝囊卑鄙。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讨论：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荒唐大谬时从来不敢发出一言，可是对他们当中的更优秀者却决不肯放过——他们这时候倒是颇能下得手去，所谓“无所不用其极”。这常常让人觉得“人”是很脏的一种动物，给人一种丑陋感和无望感。

王光东：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我们看到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也世俗化的同时，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些倔强的背影跋涉于世俗的大地上，守望着一种精神，或者用思辨的学术语言，或者用想像的、富有文采的文字，传达出对于人类的关心，揭示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人的漠视和戕害的现象。尽管这种戕害有时是在一种崇高的名义下进行的，而艺术却常常穿透“历史”背后所隐藏的真相，揭示历史中的人所具有的邪恶本质，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道义精神充分地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往往表现出

“特立独行”的气魄，与“现实存在”形成某种程度的对立，你的小说始终贯串着这种精神。你早期的小说《一潭清水》，敏锐地看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人的淳朴道德的破坏性作用，愤怒而不无伤感的指责“世俗民风”被物欲激荡起的涟漪散发出的“刻薄”气息，怀念着“清水般的纯净和美好”。《古船》中的隋抱朴——作为善与美的象征，如雕塑般默默隐身于老磨房，但他的“心”和“眼睛”始终与历史、现实、未来纠缠在一起，感悟着血腥的屠杀中飘散出的残酷气息和人性的毁灭，体味着四爷爷、赵多多等人在“传统道德”与政治联姻后内含的邪恶本质，还有在商品经济的历史旋涡中激荡起的人性变异……在隋抱朴的精神视野中，半个世纪的历史变化和人的变化始终处于被批判、被审视的位置上，隋抱朴早就像是一个承受了所有苦难之后的“智者”，在废墟的旷野上有了向世人言说的“自信”和“指路人”的自我身份确定，阅读者也真诚地从他的言说中理解了真诚、痛苦与历史思考的正确性。也就是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知识分子精神”所具有的力量，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力量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那樣的激动人心。这种精神在与“现实”相对应的“自然”世界则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你写完《古船》后，曾写过一批对“自然”充满真情与挚爱的中短篇小说，至今我们仍然记得《海边的雪》。这一篇有点“魔幻”味道的小说在当时带给我的感动，那种天人合一、物我无间、人人相爱的和谐图景与《古船》、《秋天的愤怒》等作品不同。这类作品没有激烈的愤怒、伤感，有的是温馨、欢乐。我觉得，在这类作品中，你是把知识分子精神

放置在了一个“理想”的想像境界来表现的，实质上仍然折射着你对“现实”的批判，在一些作品中，像《蘑菇七种》、《我的老椿树》等，美、爱、责任成为着力表现的主题。具有灵性的“老椿树”，不仅与女人生下了孩子，而且还有不惧艰难的勇气和柔情，在苦难中承担了养活孩子的责任。“老椿树”作为与严酷现实生活的对立者，是“爱的精灵”的象征。人只要对周围的人、事、物充满了柔情、爱意，就不会被遗弃和仇恨包围。“自然”不仅以这样的一种态度来深爱着生命，而且跨过“族类”的隔膜，共同携手获得生命的存在意义。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你这么多年的写作实际上是在做同一件工作，那就是寻找一种理想的、自然的东西，凭借着这种东西，使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环境和时代的变化。

张炜：人的一生实际上能做成的事情是很少的。人这一辈子聚精会神、倾尽全力于一种事业，能做得比较好也极为不易，也就算胜利了。但现实的情形是大多数人并不专注。为什么？因为要有许多时间用来嫉妒和虚荣。我们都知嫉妒不好，嫉妒会产生出致命的恶